

【论 文】

中国民族研究的“边界”理论想象

常 宝*

提要：随着国际政治格局转变、民族主义回归与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复杂化、多元化，学界从反思的视角重新关注“边界”概念，在中国民族研究领域也有所反映。在族源、现代国家、文化与文明、社会阶层和知识等概念的交错与纷争中很容易发现“边界”符号、因素和变量，可以通过这些概念想象“边界”，这能够为研究视角宏观空洞、研究方法陈旧保守的国内民族研究领域提供一些新的维度，以拓展其跨学科、跨专业视野。

关键词：民族研究；“边界”理论；想象。

一、“边界”与“边界”的反思性研究

中国是个多民族、多族群现代国家，多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生活关系历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和研究焦点，进而自然发展形成了民族研究的多门专业领域和研究范畴。

在民族研究中，尤其在中国国内多民族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视角多种多样，从不同专业和学科维度描述、分析和介入少数民族政策、经济生活、历史、文化认同、宗教信仰和民俗等多领域，初步构成了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众所周知，中国民族研究是汉族“缺席”的少数民族研究。很多研究虽然不直接涉及到汉民族政策、经济生活与宗教、文化与认同，但都不能回避讨论民族关系问题，尤其都涉及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即自然保留和关注民族“边界”概念及其相关意义。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认为：“从实体论到关系论是当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根本没有必要做出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社会现实的内容既体现在行动的现实，又体现在结构的现实中，二者同样重要，就存在关系之中。”¹ 因此，笔者在一篇论文中也强调了“关系论”在当代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写道：“从‘关系’视角审视和分析当代民族问题时关涉到民族地区政治权益、人才市场、社会资源、地位分配和精英培养方向等一系列问题，甚至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族心理调适、社会流动等诸多方面。”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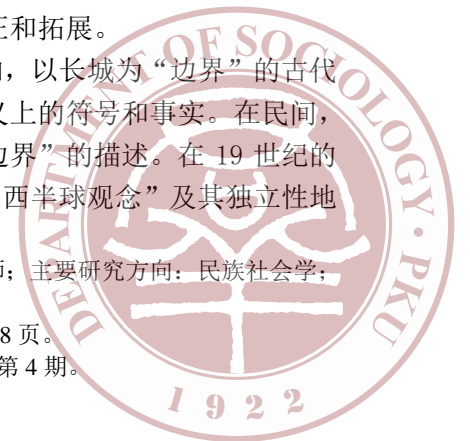
“边界”是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指标，也是民族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西方学术界对此有过充分的讨论。当然，关于“边界”的研究和探讨早已超越和扩展了传统“边界”的地理历史属性，进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研究阶段，这归功于西方学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现象学”(phenomenology)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等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的积极探索和长足发展。那些西方学者率先对社会事实、现象和知识提出了质疑，并从另一角度挑战、批判、否定和解构那些曾经的典范、正统、权威和垄断性思想及认知体系，对“边界”、“边缘”在内的很多传统社会科学概念和知识结构进行了改造、纠正和拓展。

我们知道，传统的“边界”是具有地理、历史属性的概念。例如，以长城为“边界”的古代中国中原与北方诸部落之间的界限具有显著的地理、历史和行政意义上的符号和事实。在民间，人们经常说的“山分梁子，水分亲”就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活“边界”的描述。在 19 世纪的美国，区分、隔断美国与欧洲传统的“美国例外”的“大陆主义”、“西半球观念”及其独立性地

*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艺术社会学。

¹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268 页。

² 常宝，“社区的‘多民族化’与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西北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



理“边界”概念一度盛行，他们认为：“浩瀚的大西洋把西半球与欧洲分隔开来，并构成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使新旧大陆分属不同的地理和政治体系，美国的利益集中在西半球”¹，如此“大陆主义具有很强的地理决定论色彩，培育了一战前美国人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对外关系思想，包括‘美洲体系’思想、互不干涉原则、西半球观念、‘天命命运’思潮，而这一切都构成孤立主义的思想基础。”²如今，我们很多人说的“少数民族地区”等与民族与族群相关概念都涵盖着清晰的地域性因素和背景知识。与此相反，在反思性视角下的“边界”概念拥有了很多符号意义、权力资源和社会优势等新的意义和实践性、动态性的行动趋向。简而言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边界”概念由原来“民族-国家”时期“地理历史”属性转变为注重时空、主体、心灵与认同等综合因素的“符号生活”视角与维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从“地缘政治”转变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³当然，反思的“边界”概念体系没有忽略地理历史“边界”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在人类认知与生产生活过程中自然环境和地理方位无疑是最为基础性元素。

对“边界”的反思性研究有几种特点和内涵。首先，反思的“边界”理论认为“边界”既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点，也不是几何学的一条线，它是点与线构成的“面”的体系和空间维度。其次，流动性创造和销毁了“边界”，人口、资源和文化因素的流动对“边界”起到关键性作用。再次，将“边界”置入“博弈”的时空或场域，认为“边界”是社会“博弈”的资源，也是手段。例如，自然中的山河，当然是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族群的自然屏障和地理边界，在符号化、认同化的信仰系统中山河会成为新的“边界”，例如，在川西羌族信仰中，“山神是地盘界限的保护神，所祭山神也便是借此文化行为来强化一人群的资源边界。”⁴再举个例子，在西方，“西方”概念的诞生是欧洲、美国、东欧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性质、内容和形式演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白人”、“欧洲”和“新大陆”等“边界”概念从其地理历史、人种、种族等自然属性转化到政治文化、权力结构和符号意义的结果。

二、中国民族研究中的“边界”研究状况

如前所述，在中国民族研究中虽然几乎不关注和研究汉族群体，但所有少数民族研究都涉及到与汉族之间的“关系”，“边界”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地理方位（中央与边缘、内地与边疆、城镇与乡村）、语言、阶层、职业、文化和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非同根性及其不同叙事呈现在民众和精英的日常生活中，可言为“边界”无处不在（everywhere is border）、无时不在。当然，那些超越传统地理历史范畴的作为资源、权力、符号和心灵认同的“边界”不是静态的结构化存在，而在不断的流动、演变和延续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过程。就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社会结构（structure）与行动（action）糅合在一起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概念，“边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praxis）基础之上的动态体系。

作为民族群体的社会实践与行动的过程和结果，民族社会有其政治诉求、经济生活和认同及其“边界”的社会结构和符号意义。其中，“边界”是链接、区隔和维系不同民族、族群的点、线以及由那些点、线构成的区域（zone），它的地位、功能和符号意义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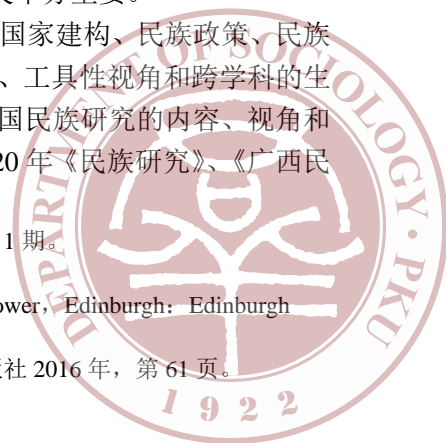
纵观当代中国民族研究的基本内容、特点和趋势，大多数研究从国家建构、民族政策、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等宏观认同概念入手，对“边界”等一系列微观、工具性视角和跨学科的生动、鲜活和实用性概念的认识、理解、挖掘和利用严重不足，导致中国民族研究的内容、视角和方法的一些单一性、片面性和空洞性发展特点。就从2000年以来近20年《民族研究》、《广西民

1 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2 同上。

3 参见 Nick Vaughan-Williams, 2009, *Border Politics: The Limits of Sovereign Pow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38.

4 王明珂著，《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页。



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和《黑龙江民族丛刊》等几种民族研究中文核心期刊所刊登的学术论文主题来看，呈现出“边界”等几种相关概念在论文主题中的出现率有些差异的情况。

笔者 2019 年 10 月 20 日通过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在“高级检索”区中分别输入“主题：‘边界’等三个概念；检索时间：从 2000 到 2019 年；来源刊物：《民族研究》等四种期刊名称”后的检索结果如下表：

表 2000-2019 年国内五种核心期刊论文“边界”等主题分布情况

检索主题 期刊名称	边界		边疆		边缘	
	相关论文数量	实际包含主题字样论文	相关论文数量	实际包含主题字样论文	相关论文数量	实际包含主题字样论文
《民族研究》	20	10	249	154	65	44
《广西民族研究》	29	12	57	42	11	8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5	6	44	31	13	5
《西北民族研究》	17	5	26	11	15	12
《黑龙江民族丛刊》	15	1	77	52	6	3
合计	106	34	453	290	110	72

从上表检索结果看，在“边界”、“边疆”和“边缘”三种主题中，“边疆”主题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两种概念，其中“边界”概念的关注度相对最低。诚然，只从期刊论文“主题”检索的结果不能说明和论证有些主题中没有“边界”字样的论文具体内容中丝毫不涉及“边界”相关研究的事实，但主题检索对研究状况分析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和解释力。

2000 以来中国民族研究对“边疆”概念的关注明显高于其他两个主题概念，这说明了“边疆”概念的普遍性、传承性特点，长期以来，在国家政府民族话语、民族政策与学术研究中“边疆”概念有深厚的基础、惯性和认可度。但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传统“边疆”地区时空（距离和时间）结构发生巨大变迁，“边疆”概念原有的遥远、孤独、异域和族群等意义逐渐被解构，逐渐丧失其传统意义。因为，“边疆”概念毕竟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严谨、生活意义上的实用概念，经不起当代社会与民众擅长的反思性审视和解构性分析的严酷考验，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当代“边界”等诸多反思性、工具性概念和认知体系。

可想而知，当前民族研究领域对“边界”等反思性、工具性概念的理解、开发与利用的概率和效率十分有限，仔细分析和研究上述《民族研究》等五种民族研究中文核心期刊对“边界”概念的讨论和使用情况，依然可以看到有很多偏颇和传统痕迹。例如，《民族研究》等五种中文核心期刊 34 篇“实际包含‘边界’主题字样论文”中可归纳出以下几种情形：首先，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论文不再以传统、单一的地理历史上的“边界”概念研究民族关系问题，大部分论文从人口流动、文化认同、权利分配、国家与民族关系的转变视角对民族关系进行了综合性讨论。例如，“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以昆明市布依巷为例”（何明；木薇）、“族群边界视野下赣南畬族与客家共生互补关系”（李安辉；钟观福）等论文从族群“边界”视角对城市多民族关系、文化互动和认同建构过程进行了研究。其次，有学者以“边界”概念超越了传统国家界限。例如，“边界与通道：昆曼国际公路中老边境磨憨、磨丁的人类学研究”（朱凌飞；马巍）、“民族·乡土领袖·边界——广西中越边境跨国民族发展新动向实证研究之一”（罗柳宁）和“想象与真实之旅：在韩朝鲜族的跨国体验和流动的象征边界”（李梅花）等论文研究跨国族群的政治关系、文化交流和认同体验等多变、复杂的边境问题，拓展和补充了传统“边疆”研究的短板。再次，部分论文，例如，“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陈宇思）、“边地、边民与边界的型构：从清代湖南苗疆到民国湘西苗族”（赵树冈）等论文对明代、清朝等历史时期的族群关系、国家建构和地方认同进行了文献研究，在时空上进一步拓展了“边

界”研究。除了上述三种情形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情形是部分学者从世界眼光归纳和综述了国外反思性、批判性“边界”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最新动态，给中国民族研究的“边界”视角提供了新的参照性知识，也有学者对“边界”概念进行了理论思考和解释，推动了“边界”理论在民族研究中的应用和跨学科对话视野的拓展。这里可以提及“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赵萱；刘玺鸿）、“从‘国家之边缘’到‘边界为中心’：全球化视野下边境研究的议题更新与范式转换”（朱金春）、“从认知研究视角看族群边界理论：原生论与场景论的一种融合路径”（张超）等相关论文。

总而言之，从近20年《民族研究》等几种中文核心期刊民族研究论文主题看，“中华民族”、“民族政策”等国族与国家层面的讨论和论述占绝大多数，“边界”等相关概念的研究甚少，但现有关于“边界”主题研究呈现出初步的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轮廓和端倪，使当代民族研究获得了时空与实践的拓展，能够准确把握和捕捉空间资源和时间流动的多样性，权利、符号和认同在“边界”的交错和互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焦灼性获得了人们的积极关注。

三、“边界”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可能的想象

如前所述，中国民族研究是个几乎不讨论汉族即汉族“缺席”的研究领域，但这领域研究的所有问题没有脱离和甩开汉族，研究少数民族的一切内容和视角都涉及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克雷弗克之问”（“美国人，这个新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式的对“中华民族”研究或者少数民族自身探究都关涉到“边界”概念体系。

（一）族源与民族的想象

想象，不等于无端的思辨或凭空的冥想，而是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认知、发现和挖掘过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从宗教信仰、时间观念、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等角度分析和解释了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概括族源、民族和民族主义现象，大大扩展和丰富了族群、民族研究的理论视野。

在中国，关于族群与民族，在政治领域、学术界和各民族民间有很多想象和描述。例如，关于“汉族”族源和名称有“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的传说，有学者考证认为：“‘汉人之’称来源于汉朝，意谓汉朝之人，至北魏末，变为中国人的别称。”¹“今人必曰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²到当代，人们对汉人族源和名称的认知依然很模糊，杂糅和混合成为描述汉族族源的主要词语，似乎在华夏与汉之间的糅合、整合及其组建“中国本部”等核心观念上有了普遍的共识。

自古以来，中国内部多民族之间的主要“边界”不在于族源的差异和体质、生理与血缘的不同上，而在于一直被建构和强调的、构成“中国本部”的汉族与周围四夷之间的“中心与边缘”、“中原与边疆”等阶序性话语“边界”，其中，“有教无类”成为超越“边界”的重要条件。

除了汉族，在中国各民族内部也有很多族源“边界”想象。例如，关于蒙古人族源，《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合罕的祖先孛儿帖·赤那奉上天之命而生。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他们]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斡罕·合勒敦山，驻扎下来。生下儿子，名叫巴塔赤·罕。”³这就是蒙古人最初的“天命所生”传说，另有“感光型”族源、“苍狼白鹿”等几种族源说法与解释。这种族源传说都与“天”有关，自然形成蒙古人关于“天之子”、“天狼”或者“天之外甥”的“天命论”观念，这就拥有了与凡俗、红尘的其他族群有“天壤之别”的“边界”。藏族族源有“印度徙入的传说”、“卵生传说”和“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等传说，这些都与佛教的发祥

¹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²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374页。

³ 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地与传播过程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宗教成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边界”标志。与此同时，在西南地区多民族中经常被发现多民族共同族源的传说，例如，“傅懋勳据西康的‘黑夷’所述，说开天辟地之后，天神用雪造了男人，雪人娶天神的女儿为妻，生下人、猴子、熊、狗等‘十二支’子孙。后来洪水肆虐，只有夫妻两人得救。‘洪水退了，他们两口子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叫武武该自（v-v-kesu），是诺苏（nosu）的祖先（按：即‘保保’或彝族的祖先），二儿叫武武拉叶（v-vlaie），是汉家的祖先，三儿叫武武斯沙（v-vsusha），是奥组的祖先（按：即‘西番’和藏族的祖先）。”¹

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人对内部与外部民族“边界”进行反思性辩解的最活跃时期之一。在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过程中，在哪个民族应是主体和核心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强烈的内部“边界”与阶层、阶序观念。当时，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杨度认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²在后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和1930年代的抗日时期兴起的“中华民族”概念使中国境内各民族族源和民族的想象出现“一边倒”趋势，“凡是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成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主张，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全体各族国民顿然沉浸于“救亡”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中华民族”内部族群和民族“边界”被淡化，外部“边界”得以加固。

总而言之，自古以来，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源与民族生成方面的分歧和差异，尤其是血缘、体质和生理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加之当代汉人对自身族源的“杂糅”意识大大淡化、模糊和压缩了汉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族源“边界”想象。

（二）现代国家的想象

现代“民族-国家”是血缘性民族与政治性国家相互融合和结合的产物。现代国家十分擅长利用和挖掘“边界”资源和符号，对外通过“边界”的防护或扩张维持国际关系，对内通过阶层化和族群化建构“边界”，维持和稳定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网和资源权力分配。

经过元明清等不同朝代和帝国时期国家形式后，中国国家建构的想象、设计和疑虑近代出现了一次重大波动和徘徊，此典型案例非清末民国时期莫属。众所周知，章太炎、刘师培、汪精卫等主张建立“单一民族”（mono-ethnic）——汉族国家的“革命派”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族群和民族一时成为中国内部重要“边界”，随后出现了关于汉人与满蒙回等其他族群之间的族源问题的多次激烈讨论。不久，在日本帝国入侵的压力和族源问题上的纠结背景下，激进的“革命派”人立即改口，中华民国应继承大清疆域和民族的呼声成为主流话语，国家建构意识和想象有了基本共识。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占领的巨大刺激下中国人“救亡”意识立即复苏，尤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保全”而不是“分裂”的情况下建立了现代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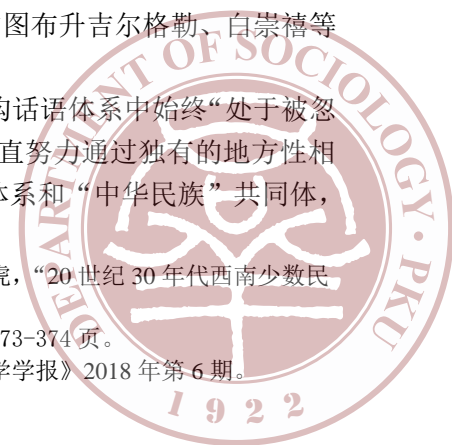
同一时期，在中国其他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建立新国家的“想象”。例如，1930年代蒙古地区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引领下成立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府”（1934年）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曾对蒙古民族独立国家有过另一种“边界”想象，尤其1939年成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使用成吉思汗纪年，首府建立在离长城不远的张家口，划定了新的“边界”——“蒙疆”，成为当代民族分裂历史的“典范”。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图布升吉尔格勒、白崇禧等一批少数民族地方代表发表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的观点。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话语体系中始终“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³，但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一直努力通过独有的地方性相互叙述和话语使当地少数民族主动靠近、靠拢和融入中国现代国家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

¹ 傅懋勳，“保保传说中的创世纪”，《边疆服务》1943年第3期。参见：蒋正虎，“20世纪3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与近代国家建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²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374页。

³ 蒋正虎，“20世纪3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与近代国家建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而不是将其分裂或脱离中国新国家体系。“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群体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叙述，将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转换为一种新的目的论式的叙述，即从历史渊源上说明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复兴上注定承担重大责任。因而，西南少数民族并不是一个区域性群体，也不是历史上中原土人想象中的异邦，而是自始至终与中原各族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¹可见，在建立中国现代国家的想象中，国内不同民族所赋予的意义不尽相同，描绘其内部与外部“边界”上出现了笔墨上的差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两种国家政策和制度无意地、客观上强化和清晰了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边界”，一是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过程，二是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革进程。

20世纪90年代登峰造极的“全球化”浪潮使得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程风生水起，不仅带来当代国家内部与外部族源和民族“边界”方面的焦灼、焦虑和想象，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双向挑战的背景下，现代国家体系也遭到了“边界”概念的反思性冲击，进而出现了现代国家话语危机甚至认同危机。例如，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美国的‘新清史’把清史不仅仅看作中国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是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强调边缘的意义，调整大清帝国内部汉族本部和周边异族的重要性。这些理论、观念和角度，其实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和认同究竟如何这样一些问题。”²

随着当代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和中国国内社会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的不断凸显，无论在国家制度层面和学术领域，都暗含着对国家内部与外部“边界”的进一步树立和整合的治国理政意识、大局视野和学术观念。例如，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尤其“发现四夷”的历史写作与国家话语体系建构进程开始有意识地纳入、参考和重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傅斯年说的“虏学”），对境内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重新认识和“边界”的清晰化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作。首先，“从‘疆域’到‘领土’这一转变，意味着作为现代国家，中国的‘主权’问题开始凸显：帝国时代含糊的‘宗主权’逐渐转为明确的‘主权’，笼统的‘疆域’（或传统所谓‘藩属’‘羁縻’‘土司’之地）逐渐被确认为有边界的‘领土’。”³其次，方法论上的“水中游的活鱼”式（葛兆光）和“赤脚踩石”式（王明珂）的体会、理解和解释应成为社会群体、民族、异文化“边界”研究的新趋向和工具。因为，与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一样，“边界”也在不断流动和变迁的过程中，进而当代中国国家正统历史叙述、文化阐释和多民族日常生活“边界”的定义和想象有了转向的迹象和新趋势。有学者曾对“边界之内是民族史，边界以外就是中外关系史，在核心地区是‘内地’，靠边儿上的是‘边疆’”⁴的传统视角和观念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如果谈历史，边缘和中心不要过于固定化，不要用现在国家来倒推历史，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过程中看中国疆域的变迁”⁵并主张“说古代的时候我用‘疆域’这个词，但是讲现代的时候我用的是‘领土’这个词，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⁶由此，在关于现代国家叙述中，对历史上不同朝代“边界”与当今国家“边界”之间的重叠性问题进行了争论，有学者认为：“蒙古造就了世界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从而给予了中国广袤的地缘，满清将此巩固。两个‘大’结合起来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中国。”⁷这些都是出于反思性、批判性视角理解的解释现代国家“边界”的学术观点和想象。

¹ 同上。

²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³ 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文史哲》2019年第3期。

⁴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⁵ 同上。

⁶ 同上。

⁷ 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我的‘民族’，你的‘问题’”，《伦敦政经中国发展社团》(China Development Society (CDS))，2017-2-3。



（三）文化与文明的想象

文明从哪里来？文明的“边界”在哪里？关于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族群、民族、文化群体和文明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关于西方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很多想象、猜测和论证。亨廷顿（S. Huntington）认为：“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文明大量继承了早期的文明，包括最著名的古典文明，西方文明中古典遗产俯拾皆是，包括希腊哲学与理性主义、罗马法典、拉丁语以及基督教。”¹ 崇尚理性、个体主义的西方文明发明技术、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拥有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权力，占据当代世界文明的中心位置。

看似整体的西方文明内部充满了隔阂、张力和“边界”，例如，20世纪“西方”概念形成之前的美国文明有意识地将自身与欧洲和其他文明区分，美国人创造了独特的“美利坚”想象。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不是诞生于理论家的梦想，不是从苏珊·康斯坦号带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从五月花号带到普利茅斯的，它来自美国的森林，每当它接触到新的边疆的时候都会获得新的力量”² 当然，这样的“边界”想象很快被后来的欧洲与美国一体化的“西方”概念及其“边界”覆盖和否定。

在多元民族国家中央与地方、核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中“传统文化”符号依然停留在古老记忆和刻板印象范畴，在文化、文明与现实生活情境中清晰地看到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差异、隔阂和层级性关系甚至传统“边界”的痕迹。例如，在很多多民族现代国家，被描述成“朴实善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成员，为了生存、发展和适应，迎合当代市场规则和时尚逻辑，十分被动地表演和展示其“传统”文化体态和姿势，“在各种、各层次之社会核心与边缘关系下，国族‘边缘身体’成为文化展示的工具。”³ 但所有的文化都不是静态、被动的主体行动，而是极其灵动、高度理性和善于博弈的行动主体，充满亲和力的同时也具有强劲的排他能力和认同倾向。以蒙古族为例，他们将自己传统游牧文明的起源与发祥地与蒙古高原深处古老的“额尔古涅昆”山林和“额尔古纳”河联系起来，赞美、彰显其游牧经济与草原文明的独特性、神圣性和普适性特点。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当代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俯视”性特点，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民族虽然处于明显的被动、劣势地位，但他们的文化‘傲慢’和‘俯视’景象依然存在，他们主要用历史与环境主义不断重塑民族文化的形象。例如，蒙古族精英和民众常以成吉思汗时期辉煌的历史记忆作为文化自豪的中心，以游牧经济的环境理念作为抵触现代工业文明的有力武器，在强劲的现代文明中维护着自身民族文化的意义。”⁴ “这种族群之间看得见的，文化或认同上有象征意义的边界将不同族群区别开来。”⁵

族群、民族与国家的“边界”不仅有隔离型自我保护功能，也有扩张和扩大的行动想象，有可能使族群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主流文明获得扩张和渗透的机会。例如，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美国民族与国家想象早已超越了传统国土“边界”概念，在美国“‘国土防御’这个词本身‘充满欺骗和自我欺骗’，实际上已经过时了，美国的安全是指民主制度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土的安全，……”⁶，换言之，“美国的边疆是欧洲或‘西方’文化的边疆”⁷，西方文明前所未有地扩张了“边界”，实现了它的想象。

¹ [美]亨廷顿(S. Huntington)，徐漪译，“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6期。

² 参见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³ 王明珂著，《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⁴ 常宝，“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权、社会责任及其困境分析——以内蒙古蒙古族知识精英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⁵ Thomas M. Wilson, Hastings Donnan,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⁶ 参见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⁷ 同上。



（四）族群内部地域与地方想象

历史的“边界”是铁板一块的，其背后的个体认同也几乎是一体的。现代化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弱化了“边界”，却让个体获得接触不同世界的可能性。相比较，个体更自由地打破基于政治、地理和文化的束缚，从而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认同较传统社会分散得多。从英国北部年老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支持脱欧，南部年轻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反对脱欧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同一民族关于“边界”想象的分裂。因此，不仅在族群与民族之间，在族群和民族内部也布满了清晰或模糊的“边界”，成为民族内部关系和凝聚力的张力。如前所述，在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巨大的分歧、矛盾和隔阂，他们内部的“边界”使得他们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动力，多元、自由、理性等意涵组成了西方内部强大的生命力。英国学者谈论的移民“超级多样性”及其含义囊括了语言、宗教、职业和性别等复杂的族群“边界”性因素，“那些新移民面临的经验、机会、制约因素和轨迹，以及他们居住的境内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都是由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¹

在当代蒙古族这样的民族内部也有明显的符号与地位“边界”。以“瀚海沙漠群”（柏杨《中国人史纲》的概念）为地理“边界”的漠南漠北（即如今的内蒙古与蒙古国；清朝时期称为“外藩蒙古”与“内属蒙古”）与东蒙西蒙之间的历史、语言、传说、风俗与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蒙古族内部“边界”因素，使蒙古民族拥有了地域与地方文化想象。例如，内蒙古察哈尔部历来被称为成吉思汗的正统后裔，而东部科尔沁部被称为哈萨尔的后裔，东西部语言、风俗习惯和民族历史叙事中有明显差异。

在族群和民族群体中自然有精英与民众的社会分层。一般而言，精英群体“多语言”、统揽“边界”内外的能力和优势使他们比民众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和权力。作为知识群体和统治阶层，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也是国家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在国家或民族名义背景下谋个体利益，实现自我晋升和发展。王明珂通过民族传统服饰的穿着情况来研究羌族社会“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内部层级关系，指出：“核心人群是‘进步的’，但边缘人群则保持本民族传统。……村寨妇女在各种社会认同的核心与边缘权力关系下成为‘传统’的承载者。”²同样，在当代少数民族传统语言、符号和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并不是现代知识精英和国家干部，而往往是广大农牧民、妇女和儿童。例如，那些极力主张民族传统传承的很多民族精英把民族语言学习和传承等教育任务分给新一代孩子们身上，自身逃避于规则之外，从不参与。

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都可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边界”，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之间自然出现区隔，在现代化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很难实现平等和同步，因此，看似公平和自由的社会政策与实践过程往往带来不公平、不平衡的结果。例如，在欧洲，“到19世纪中叶，在法国或英国，他们的国家不需要采取什么强制措施来消除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的地区语言——比如布雷顿语或威尔士语——落后，剥夺了他们的孩子在现代社会的成功。”³

（五）知识与方法的亲和性想象

除了族群起源、国家政策、社会实践与行动的“边界”想象，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知识与方法的亲和性想象，也就是说，在多民族研究中可以寻找一些与“边界”相关的知识、概念和跨学科认知体系，利用它们之间的亲和性和关联程度，进一步解释和分析“边界”内外关系及其社会资源、权力结构和意义。例如，在经济社会学看来，类似中国古代长城这样早已丧失其原有政治战

¹ Steven Vertovec, Super-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0 No. 6, November 2007. P. 1049.

² 王明珂著，《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6页。

³ Michael Mann, 2005,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3.



略功能而变成历史景观的“边界”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存在一种能够解释的亲性和。“杰克逊将景观分为了政治景观、栖居景观和乡土景观三类。政治景观由政治组织依据特定的标准界定或制造而形成，由国家力量保护；栖居景观则是依照栖居者与栖居环境的关系逐渐演化形成，栖居者作为景观的一部分，而不是景观的改造者；乡土景观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景观，景观空间几乎未受到政治组织的改造，但其空间也标示了社区中的传统人际关系。”¹ 这样，包括“边界”在内的不同景观都有其国家力量、政治组织、行动者与社区的社会功能和符号意义。FONG E. 和 SHIBUYA K. 等学者从城市结构变迁过程出发，通过“种族和民族居住模式、民族企业以及种族和民族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²等三个方面来研究了北美主要城市的西班牙裔和亚洲人等族群人口。

如前所述，反思的“边界”理论不排斥传统地理历史意义上的“边界”概念，反而在传统理论与概念体系基础上发展和解释“边界”的属性和意义系统。在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天然存在地理历史的客观“边界”，这一基本“边界”能够延续和渗透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商业贸易、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从博弈论理论看，国与国、国家内部“边界”也有其亲性和解释意义。“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因此，学者们自然将这一现象与国家边界联系起来，认为是‘边界效应’造成了这一现象。边界效应是指当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时，地理边界对贸易有阻碍作用，会显著降低跨越边界的贸易量。”¹ 这就是从不同学科、专业和知识点提供不同的方法论视角和分析工具的具体案例，其中，“边界效应”就是经济学等相关专业所能建立的意义解释。

随着国际社会与国内族群、民族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纷争、资源争夺等社会关系的不断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群”、“他群”观念与认同得以加强，不同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驱动力也为“边界”认同提供力量，特别是民族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专业知识和理论思考方式为族源、民族国家及其相关特定历史提供了自我与他者相关的“集体记忆”和“边界”的专业知识和论证依据，丰富了“边界”想象，促进了社会群体认同的复杂建构。

结 语

反思的“边界”概念与传统的地理历史研究领域的“边界”有些不同，它更具有文化、心灵、资源和权力等内涵和意义，应成为“边界”研究的新思考视角。在中国学界，有关“边界”概念的反思性研究并没有那么深入，依然处于地理历史认知和“边疆”等概念的探讨层面。

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是充满“边界”符号，包括宏观的“中华民族”体系中可以找到诸多“边界”符号、因素和变量，当作研究和分析的维度和工具。例如，将“中华民族”视作外部最大的“边界”，将中国境内多民族之间的经济生活、文化认同与风俗事象“差异”看作内部“边界”，逻辑上内部“边界”构成、编织和支撑外部中华民族“边界”，外部中华民族“边界”为内部“边界”提供稳定的军事、制度、福利和认同保障，这样，内部多元，外部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界”网自然生成。

族源、现代国家、文化与文明、阶层和知识等概念都是“边界”体系中的核心要素，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反思、审视和重新组合能够丰富和促进民族研究中的“边界”想象，进而进一步打开民族研究视野和分析框架。这样的想象无疑能够为研究视角宏观、研究方法相对保守、研究工具十分单一的民族研究注入一些新的动力，促进其跨学科、跨专业的对话、互动和碰撞。

¹ 刘世定、户雅琦、李贵才，“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亲和性和互补性”，《社会学评论》第6卷第5期，2018年9月。

² FONG, E. and SHIBUYA, K. 2005. ‘Multiethnic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1, p. 285.

